



(未完待續)

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

吳汝鈞

顯示出... (續) ... 顯出另外著名的東方佛教協會，會址設于大谷大學。這協會編有英文的佛教半年期刊，稱「東方佛教徒」(The Eastern Buddhist)，其內容主要是大乘佛教，甚為海外學者所重視，亦收錄

不少西方學者的論文。這期刊雖題為以大乘佛學各面內容為標的，但筆者覺得此中實有一要傳播和發揚日本佛學的意圖，而所收的論文亦有甚多涉及這方面的內容的。其中不定期刊載有阿部正雄與美國年青學者 Norman Waddell 合譯的道元的大著「正法眼藏」中重要部份，正是這方面的顯著表現。阿部氏並且寫了一篇

有關道元的佛性論的英文論文，以比較宗教哲學的角度來顯示道元的佛性論的超越前人處，來確立道元的佛教哲學的地位。雖然，這種西方式的肯認（Western Justification），並不是必要的；但它在傳播、交流與發揚學術思想方面，却有積極的意義。

除以上那些較重要的大學外，另外還有很多大學或學院，有不少學者在努力作出對佛學研究的貢獻。如東北大學、名古屋大學、九州大學、大正大學等。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名古屋大學教授上田義文。他是唯識學學者，但不囿于唯識，而且文獻與哲學並重。名大還有傑出的佛教論理學者北川秀則，精于陳那的邏輯，近年不幸因癌病逝世。

至于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大抵只在大學研究院中進行，因西方國家並不像日本，有那種與佛教的文化關係，與佛教式的生活背景。其研究亦不如日本那樣集中，而是分散的。大抵是這樣，某一名學者在某大學教其專門的學科，則該大學不期然成該學科的研究中心。總的來說，佛學研究在西方，不算很蓬勃。其內容亦主要偏于梵、藏、巴利等語文及印度佛學方面。中國佛學的研究，在西方似還未開始；一般還是由中國人自己來搞。但那些中國學者往往不通梵藏，不能通到印度的根源方面去；在哲學方面又無基本訓練，把握不住中國佛學的根本觀念。他們只能就對中國思想的粗淺了解來說佛學，致無特殊成就，不為學界所重視。

法國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先行者。它的重心在大乘佛教與考古學的研究，那都是文獻上的事。今日不少法國學者仍繼承着 Brunouf, Lévi 等文獻學大師的遺風，如 Paul Demieville, Louis Renou, Jean Filliozat, Olivier Lacombe, Armand Minard, Andre Barcan 等。Sorbonne 大學是佛學研究中心，其前有 Poussin，近期有其傑出弟子 Etienne Lamotte。後者以翻譯「大智度論」二十七章為法文而轟動一時。

英國方面，最初以翻譯和研究巴利語佛教文獻為主。其後 Max Müller 出，編集規模龐大的「東方聖書」，梵語佛典乃被重視，而佛學的哲學涵義亦漸為人所留意。一九〇六年有佛教協會（The Buddhist Society of England）成立，出版期刊「佛教

評論」（Buddhist Review）。一九四三年刊行「佛教徒在英國」（Buddhist in England）其後又出「中道」雜誌（The Middle Way），以迄于近時。學院式的研究，當首推倫敦大學的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其中有印度、巴基斯坦及錫蘭系（Department of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有幾個學者任教與佛學有關的科目。D. L. Snelgrove 是西藏學家，J. C. Wright 是梵學家，T. Gelblum 研究印度邏輯。另外英國有一個禪學怪傑，便是 Alan Watts，他是一個討厭學術研究的人物，但據說他對禪理有很深刻的體會。

德國與英國一樣，最初亦以巴利語佛教與文獻翻譯研究為主，Hermann Oldenberg 是此中的代表。其後學者漸轉到大乘佛學方面去。漢堡大學是一個佛學研究中心，其中有 Lambert Schimhausen，精研佛學與吠檀多哲學。他是 Frauwallner 的高足，走文獻與哲學雙軌之路。他的哲學智慧，表現于他研究瑜伽師地論的專書 *Der Nirvāṇa-Abschnitt in der Vinīśayasamgrahaṇī der Yogācārahūmih* 中。他在漢大主持印度文化歷史一系（Seminar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Indiens）。漢大的另一系即日本語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Japans），有 Oscar Benl，精通日本古典文學，他曾把「源氏物語」譯成德語。他又研究禪學，特別是日本的道元禪。他又翻譯了一些日本禪籍，如「夢窗國師語錄」和「聖一國師語錄」等。他的研究，甚受日本及西方學者重視。另外，在 Göttingen 有 Becher 研究原始佛教，在慕尼黑有 H. Hoffmann 研究西藏學。（按：有關德國之佛學研究，請參閱筆者「德國之佛學研究」一文）。

奧國的維也納是另一佛學研究中心。維也納大學有一印度學研究所（Indologisches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Wien），其中有鼎鼎大名的 Erich Frauwallner。他是一個印度哲學與佛教學者，尤精佛教論理。他在維也納開出一種研究佛家邏輯與知識論的學風，創刊 WZKSÖ 學報（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而置其重點于陳那與法稱的哲學。Frauwallner 近年逝世，其下有 E. Steinkellner，是法稱專家。

荷蘭方面，前在 Leiden 大學有 DeJong，近年已移至澳洲國立大學。現在 Utrecht 有 T. Vetter，為佛教論理學研究專家，專于法稱與吠檀多哲學。

意大利有卓越的佛教學特別是西藏佛教學者 Giuseppe Tucci。他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是一個文獻學家，同時對佛教哲學有深邃的了解。Tucci 會長期任羅馬大學印度和遠東哲學宗教系的教授。

美國的佛學研究歷史比較短，它受歐洲風氣的影響，亦以佛教經典的語言學的研究為始。一八九一年創立「哈佛東方叢書」(Harvard Oriental Series)，出版大量佛教書籍。一九四八年開始在夏威夷舉辦東西哲學家會議，通過日本學者鈴木大拙的介紹而掀起研究東方禪學的熱潮。大學的佛教課程，通常設于宗教系、印度學系或亞洲學系中。設于哲學系的比較少。可能由于彼邦的學者對佛學的把握，基本上是文獻上的或宗教上的進路之故。據筆者所知，美國大國哲學系設有佛學課程的，只有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園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及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園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中，其中有一佛學研究組 (Group in Buddhist Studies) 是美國有數的佛學研究中心。這不是一個系，而是一個中心，其成員都是與佛學研究有關的各系的教授。這一中心強調基本語文與文獻學訓練，分梵藏與漢日兩組。其中有哲學家 J. Frits Staal 教印度與佛教論理學，Lewis R. Lancaster 教梵文與大乘佛學，Padman-abha S. Jaini 教印度佛學。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園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東方語言學系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華裔學者陳觀勝 (Kenneth K. S. Chen)，研究中國佛學，陳氏著有「佛教在中國的轉化」(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甚受學界重視。Hartmut E. F. Scharfe 專于印度學與梵文，日本學者 Ensho Ashikaya 教西藏文。

威斯康辛大學的南亞洲研究系中有佛學一支，是另一佛學研

究的去處。其中 George L. Hart 精于梵文。年前去世的著名中觀學者 Richard H. Robinson，亦曾在此執教多年。

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宗教系有日本學者永富正俊，專于大乘佛學與佛家論理。梵文與印度學系有 Daniel H. H. Ingalls 教印度學。

另外一佛學研究中心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但它在加拿大，這裏亦不妨一提。此中宗教系有佛學一門，有 Leon Hurvitz 教東方學；他二十多年前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另有 Arthur E. Link 教中國佛學，日本學者 Iida Shotaro 教西藏文與西藏佛學。

另一加拿大校麥馬斯達大學 (McMaster University)，其宗教系陣容浩大，強調主科與宗教學一般的雙軌研究。其中分兩小組 (Group)。第一組強調聖經研究與西方宗教思想；第二組強調佛教、印度教和印度哲學。其中有中國學者冉雲華，任佛教思想史，強調佛教史學，曾寫有「宋代佛教史料編纂法」(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ung China) 一文。冉氏早年留學印度，畢業于 Visva Bharati 大學。

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亦堪注意。年前開始設立一宗教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ligious Studies)，亦有佛教一項，有學者多人。另外的梵文與印度學系，則強調印度方面的研究，分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四支。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的 Alex Wayman 研究如來藏學，他的近作是把「勝鬘夫人經」翻譯成英語；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園的日裔的 Kenneth K. Inada，研究中觀學，都是學界所重視的學者。

以上介紹的，只是一般較為人所留意的，且主要限于大乘佛教。南方佛教方面，筆者相信亦有不少研究中心，但就淺見所限，不及多提。

七、結語——回顧與展望

以上我們就幾方面對日本及歐美的佛學研究，作了一個描述

。這裏要以這兩方的佛學研究的方法作參考，對我們中國的佛學研究反省一下，並展望將來應行之道，以結束本文。

方法直接影響研究成果。嚴格地說，以西方及日本的方法為標準來說，中國的佛學研究，還未開始，故亦無成果可言。唯一例外的，似乎只有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印順的「中國禪宗史」。不過，日本及西方的方法亦非完善。以下先將中國的佛學研究作簡單的了解看看。

比較有系統有規模的研究，要自民國初年出現的南京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始。那是佛學團體內部的研究。前者由歐陽竟無大師所創，其重點幾全是唯識學。歐陽自身是唯識學者，其下邱虛明、王恩洋、呂澂諸人，皆只講唯識學。武昌佛學院為太虛大師所創，其下有印順、法尊諸人，雖強調八宗平等，但其重點仍在般若。印順自身即是一個對龍樹的中觀學很通透的學僧，這可見于他的「中觀論頌講記」中。站在比較哲學的角度，把佛學作為一種思想一種哲學來欣賞來研究的，則有熊十力對唯識學的研究，及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對中國佛學的研究，後者的「佛性與般若」，是剖析中國佛學的巨著，而特崇天台，以之為圓教之圓者。熊本屬支那內學院，其後因不滿其死守唯識家教而退出，獨自展開其新唯識論的形而上學體系。這種研究，是純思想形態。胡適的禪宗史特別是神會的研究，則是走史學之路；他反對鈴木大拙的禪的神秘主義的說法，以為禪理可由理性認識來把握。另外一個中國學者林藜光，在巴黎專走文獻之路，其活動甚為西方所重視，但鮮為國人所知，他的「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為對後期小乘佛教的「正法念處經」(Saddharmasmityupasāhānasūtra)的專題研究。可惜他早年逝世。

一般來說，中國的佛學研究，都缺乏以語言學與目錄學(Philology and Bibliography)為主脈的文獻學知識。內學院所走的路，雖然是文獻學的，但其基礎顯得甚為薄弱，其中只有呂澂一人稍通梵藏。他譯有一些梵藏原典，包括陳那的「集量論」；但幾乎不能閱讀，因其所用術語(terminology)古舊，與現代的術語接不上，亦缺乏西方那套邏輯與知識論的基礎。稍為有水準

的，只有太虛系的法尊，他精通藏文，譯有不少西藏方面的資料，如月稱的「入中論」與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等，亦甚為日本學界所重視；可惜他除了翻譯幾本論書外，沒有其他表現，其智慧恐不足以照見佛家奧蘊。另外有旅美佛教學者巴由(W. Paulow)，他精于梵文與巴利文，其對南傳佛教的研究，達到國際水平。但中國像法尊、巴由這類學者，還是少數得很。

熊、方、唐、牟即一路，是哲學家談佛學。雖不講文獻學，亦不必一定能客觀地對諸學派作一個還其本來面目的描繪，例如在熊著「佛家名相通釋」、「十力語要」、「新唯識論」等中所表示的世親唯識學，就細微處言，恐不必都是世親的真面目，因熊自身基本上是以護法的「成唯識論」來了解世親，而實際上，護法與世親的思想是有距離的。但從大處言，能透過綜合比較哲學來把握各宗派的基本精神，及衡量其理論上的優劣，那是沒有問題的。如五六十年前屬於這一路的梁漱溟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把印度精神判為反身向後，以別于西方的奮勇直前與中國的調和持中，梁本人恐無對佛學或印度學的文獻學知識，但這見解就大處看是確當的，表現一種文化哲學的智慧，不過以這種姿態來開佛學研究的風氣，以至于建立佛學研究的傳統，顯然是不足夠的。其主要的是缺乏文獻學那一套裝備。

筆者這裏絕無輕視哲學而提高文獻學的重要性之意。反之，筆者始終覺得哲學是目標，是質，文獻學是手段，是量。倘若無哲學作為最後的歸趨，即使有最豐富的文獻學知識，其意義亦不能確定，亦總是末路。筆者的意思無寧是，文獻學對於學問研究來說既然是一裝備，一方法，那麼要搞學問，就非要把它掌握不可。否則，客觀的學術研究，一定不能建立起來。因為文獻學背後是一求知精神，把這一套方法掌握起來而適當運用，這需要事功精神。自然這不必是唯一的方法，而對客觀的學術研究在價值方面的確立，亦不能依文獻學。這些都涉及比較專門的哲學問題。筆者無意在本文中展開討論。這裏只想指出，中國人一直輕視文獻學，結果嚴格地言客觀的學術研究傳統總建立不起來。

(未完待續)